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的城乡共同富裕效应

何　静[1,2a]，刘振亚[2b]

（1.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2. 盐城师范学院 a. 文学院；b. 商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摘　要：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是调节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政策，可为城乡共同富裕注入政策动力。基于 2009—2023 年中国 25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构建了城乡共同富裕指数，并基于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准自然试验条件，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实施可正向推动城乡共同富裕，且该结论经过反事实检验、异质性处理效应、倾向得分匹配检验（PSM-DID）、剔除其他政策影响及替换被解释变量衡量后仍然成立。中介机制检验发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与要素市场化配置在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证实，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对城乡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在共享性层面、大城市及以上规模城市、东部地区更强。因此，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扩容提质、持续完善高质量充分就业制度、加快构建城乡统一资源要素市场。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城乡共同富裕；高质量充分就业；要素市场化配置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25）05－0090－13

一、问题的提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集中体现。就现代化发展的实际进展而言，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突出，且城乡产业发展、经济总量、收入分配与公共服务共享之间仍然存在绝对差距，对共同富裕进展形成阻碍[1－2]。以城乡维度切入来看，扎实推进城乡共同富裕是一项复杂性、长期性并存的工程，仍然需要开展深度的动能探索。2025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召开“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时重点强调，“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动共同富裕”，充分指出推动城乡共同富裕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基于这一政策部署，加快寻求城乡共同富裕的创新动能，是学界的研究要点所在。

新型城镇化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兴概念，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调节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举措，对城乡共同富裕具有促进作用。2014 年 1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印发《关于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的通知》，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为其他区域推进新型城镇化提供指导。同时，该文件确定将江苏、安徽两省和宁波等 62 个城市（镇）作为首批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区域。随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在 2015 年、2016 年陆续发布第二批与第三批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区域，将广东茂名市、山东济南市等 170 个城市（镇）纳入试点范围。由此引发的思考是，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作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核心政策措施，是否可同理论预

收稿日期：2025－03－25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25.05.007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项目（2019SJB718）

作者简介：何　静（1987—），女，江苏泰兴人，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同富裕。E-mail：HL8868865@163.com

期一般促进城乡共同富裕,这一推断仍然有待提供经验证据支撑。另需明确的是,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在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其他机制。深度解答上述问题,对于深刻推动城乡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新进展、系统布局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具有重要现实作用。

二、文献述评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是 2014 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1 部委联合启动的政策实践,旨在通过探索户籍制度改革、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等五项核心任务,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在试点区域持续拓宽与内容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学界对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政策效应展开全方位探讨。就环境治理效应而言,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可以实现城市低碳治理[3]、改善空气质量[4]。就农村居民收入提升效应而言,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可以提高农户生计资产收入[5]、缩小城乡收入差距[6]。就城乡要素配置效应而言,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可以促进工商资本下乡[7]与金融资源配置优化[8]。那么,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作为推进城乡产业协作、要素配置与经济融合的重要政策措施,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现有研究以宏观的共同富裕作为切入点,解析了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张明斗和乔雪蓓[9]、杨宇等[10]实证检验发现,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均可促进共同富裕。对学界关于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政策效应研究结论进行梳理,发现相关研究围绕环境治理、农村居民收入提升、城乡要素配置,以及宏观共同富裕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入研究,这为本文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与城乡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提供翔实经验参考。不可忽略的是,现有研究对农村居民收入提升、城乡要素配置等方面均存在微观视角的局限,且并未深入解析更深层次的城乡关系。

城乡共同富裕是促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必要前提,也是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梳理当下关于城乡共同富裕的文献可知,已有研究普遍侧重使用定量分析方法,通过实证分析寻求城乡共同富裕的创新动能。田祥宇等[11]、许睿杰[12]从数字经济治理层面切入,发现数字乡村建设、数字政府建设均可促进城乡共同富裕。韩先锋等[13]、贺建风和周玉兰[14]分析发现数智化转型与数据要素市场化也可促进城乡共同富裕。需要强调的是,城乡关系建设属于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协同推进的宏观工程,必然需要政府部门以政策“有为之手”进行引导与协调[15-16]。进一步解析城乡共同富裕的政策动能,结果得出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设立[17]与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建设[18]均可促进城乡共同富裕。对已有关于城乡共同富裕的研究内容及结论梳理可得,学界已经从多个层面、多个维度开展研究并厘清城乡共同富裕的动能所在,形成丰富研究结论。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政策议题下,更需迫切地以城乡共同富裕作为重点,深度解析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然而,学界少有研究探讨新型城镇化试点与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证关系,存在可拓展的研究空间。深入厘清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与城乡共同富裕因果关系,可为系统布局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共同富裕取得新进展提供实践参照。

根植于上述研究结论及述评情况,本文拟从以下方面展开研究并作出创新性贡献:第一,基于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分批实施的准自然实验条件,应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对城乡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有效拓展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效应与城乡共同富裕动能的研究边界。第二,将高质量充分就业、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中介变量,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影响城乡共同富裕的中介机制,为政府协同社会各界共同推动城乡共同富裕提供路径参照。第三,以城乡共同富裕类型、人口规模、所属经济地带为异质性检验标准,探讨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差异化影响及其背后的原因所在,为各地政府因地制宜推进城乡共同富裕提供经验参照。

三、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一)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与城乡共同富裕

威廉·阿瑟·刘易斯在1954年首次提出城乡二元结构理论,指出社会经济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会因制度、产业等方面的差异造成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对立,且由此形成城乡资源分配失衡与发展差距渐次扩大的现象[19]。新型城镇化政策试点是中央政府调节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的政策举措,既可通过促进农村产业经济增长满足发展性要求,也可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共享性要求,助力城乡共同富裕。从促进农村产业经济增长的发展性层面来看,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强调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共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以此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20]。同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通过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渠道,促使各类先进生产要素流向农村,为农村经济增长提供要素支撑。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共享性层面来看,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强调消除城乡户籍制度壁垒,促使农村户籍人口能够享受常住区域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均衡供给。另外,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还强调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农民群体非农就业,以此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综合上述理论阐释,提出以下待验证假设:

H1: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可正向促进城乡共同富裕。

(二)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高质量充分就业与城乡共同富裕

受技能水平、教育基础以及所处地理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农民群体完全依靠农业生产经营、提升农业收入进而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路径成效有限。而高质量充分就业可以拓展农民非农收入空间,促使农民公平享受职工保障,成为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核心路径[21]。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技能培训、岗位信息等一系列配套就业服务,促使农民群体具有更强的就业适应能力。这一措施显著推动农民群体向非农就业转移,促进农民群体实现非农领域的高质量充分就业。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推动三次产业在县域空间联动,催生更多高薪资水平、高保障待遇的非农就业岗位[22],由此驱动农民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在一定程度上,高质量充分就业可使农民群体获得更加稳定的收入来源与可靠的社会保障,驱动农村依靠农业生产的低收入群体获得工资性收入,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助力城乡共同富裕。此外,依据马斯洛需求理论来看,高质量充分就业可在满足农民群体生理、安全、归属需求的基础上,逐步在就业过程中体现自身价值,获得更高层次的尊重。综合上述理论阐释,提出以下待验证假设:

H2:高质量充分就业在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

(三)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要素市场化配置与城乡共同富裕

在不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与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依靠要素集聚与规模效应的优势具有更高的经济活动效率,而农业农村却因产业单一与经济效益较低陷入发展困境,由此形成各类要素由农至城的单向流动结构。新型城镇化属于政府介入调节要素错配的政策手段,可以通过政策信号的合理引导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为城乡共同富裕提供助力。详细而言,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通过制度改革与政策调整,打破技术、资本、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壁垒,促使各类要素资源实现城乡之间的双向自由转移[23],助力要素市场化配置。同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依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度实施,推进农村土地要素入市流转,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在一定程度上,要素市场化配置可促使各类高质量要素资源下沉至农村地区,发挥要素集聚效应助力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24],进一步提升农民经济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助力城乡共同富裕。另外,要素市场化配置也可实现城乡之间数据、信息自由流动,以此弥合城乡之间的数字与信息鸿沟,加速推动城

乡共同富裕。综合上述理论阐释,提出以下待验证假设:

H3:要素市场化在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

四、实证设计

(一)模型构建

1. 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借鉴于赟等[25]的模型构建经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以识别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对城乡共同富裕的驱动效应是否存在,回归方程详见式(1):

$$CNPYUN_{it}=\beta_0+\beta_1 DID_{it}+\beta_2 CONTROL_{it}+\delta_i+\varphi_t+\varepsilon_{it} \quad (1)$$

式中,*CNPYUN* 代表城乡共同富裕,i 代表城市,t 代表年份,β_0 代表截距项,β_1 代表政策净影响效应,*DID* 代表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β_2 代表系列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CONTROL* 代表系列控制变量集合,δ_i 代表城市固定效应,φ_t 代表年份固定效应,ε_{it}代表随机扰动项。

2. 中介效应模型

江艇[26]基于经济学原理,提出"停止使用中介效应的逐步法检验"这一建议。有鉴于此,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应回归方程详见式(2):

$$M_{it}=\eta_0+\eta_1 DID_{it}+\eta_2 CONTROL_{it}+\mu_i+\delta_t+\varepsilon_{it} \quad (2)$$

式中,*M* 代表研究所选中介变量,包括高质量充分就业与要素市场化配置,其余变量含义均同式(1)。

(二)变量构建

1. 被解释变量:城乡共同富裕(*CNPYUN*)

推进共同富裕,必须深刻掌握发展性与共享性的关系。其中,发展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强调经济总量扩容;共享性是共同富裕的底色,强调物质均衡与保障均衡。从这一角度出发,科学衡量城乡共同富裕的重点在于发展性与共享性两个层面。有鉴于此,以发展性、共享性为一级指标,构建城乡共同富裕指标评价体系,详见表 1。其中,发展性包括经济收入、产业发展等指标;共享性包括物质均衡、保障均衡、环境均衡等指标。在此基础上,使用熵值法测得城乡共同富裕指数。

表 1　城乡共同富裕指标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属性
发展性	经济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产业发展	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
		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三产业增加值	+
共享性	物质均衡	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
	保障均衡	农村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城镇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量	+
		农村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量/城镇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量	+
		农村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量/城镇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量	+
		农村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量/城镇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量	+
		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
	环境均衡	农村生活垃圾清运量/城镇生活垃圾清运量	+
		村庄绿化覆盖率/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城镇互联网普及率	+

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属性
		农村有线电视实际用户数量/城镇有线电视实际用户数量	+
		乡镇(街道)文化站数量/地市级(省、区、直辖市级)文化馆数量	+
		农村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场次/城镇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场次	+
		县图书馆总藏量/地市级(省、区、直辖市级)图书馆总藏量	+

2. 解释变量: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DID*)

基于研究需要,使用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城市、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代理变量。具体而言,若某一城市归为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实验组,赋值为1;若为对照组,赋值为0;若某一城市在当年及之后归为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实验组,赋值为1,否则为0。

3. 中介变量:高质量充分就业(*EMPLOYMENT*)与要素市场化配置(*MARKET*)

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概念,故学界尚未形成一致性的衡量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充分就业包括宏观层面、微观层面的多项指标[27]。为科学衡量高质量充分就业,选择就业机会充分、就业环境公平以及收入合理、保障可靠等指标进行系统衡量,对应指标评价体系详见表2。在此基础上,使用熵值法测得高质量充分就业指数。

表2 高质量充分就业指标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属性
宏观维度	就业机会充分	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数量/劳动力人数	+
	就业环境公平	城镇就业人员数量/年末户籍总人口	+
	就业结构优化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	+
	人岗匹配高效	应届高校毕业生单位就业率	+
	劳动关系和谐	劳动争议案件受理数量	−
微观维度	工作稳定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量	−
	收入合理	最低薪资标准	+
	保障可靠	医疗保险参与人数	+
		生育保险参与人数	
	职业安全	工伤保险参与人数	−

借鉴Parsley[28]与金环等[29]的研究思路,通过测算要素市场整合水平衡量要素市场化配置。详细测算过程如下:使用相对价格法测得省级层面的市场分割指数,采用$\sqrt{1/MFI}$计算获得省级层面要素市场整合指数。考虑到研究所使用的是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故以各地级市GDP占所属省份GDP的比重作为权重,乘以省级层面要素市场整合指数,由此获得各地级市的要素市场化指数,符号为*MARKET*。

4. 控制变量

公共财政支出(*PCFLEE*),公共财政支出是政府部门建立健全农村基础设施的核心措施,对补齐农村发展短板具有重要意义,使用农林水务支出的对数表示;对外开放水平(*LOSOEWD*),对外开放是促进经济发展、吸取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也是助力城乡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来源,使用区域实际利用外资的对数表示;科技创新水平(*LLOFTLIN*),科技创新是核心动力,使用专利授权数量的对数表示;人力资本水平(*LLOFHNCL*),人力资本是重要要素基础,应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衡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NWALBSES*),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技术、知识优势,可通过集约化、规模化生产经营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使用农民合作社数量与家庭农场数量之和表示;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TEDTRLEE*),农村电子商务是提升农村居民村民农业收入的创新业态,使用区域淘宝村的数量表示;农村基建水平(*RLIELL*),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是农村发展的重要支撑,使用农村公路运输线路里程的对数衡量。

(三)样本处理与数据来源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包括市、区、县、镇在内的不同层级行政单位,故基于指标可得性与样本可比性,仅选择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详细处理过程如下:当某一区域属于试点范围,则归为实验组,非试点范围的城市归为对照组。另需说明,为规避部分入选试点的区、县、镇被纳入对照组,当某一城市存在入选试点的区、县、镇时将其排除在外。据此,研究选择 2009—2023 年中国 25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其中包括 82 个处理组城市与 172 个对照组城市。

实证分析过程中所涉及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城市统计年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部分指标数据来源于政府部门官网与 EPS 数据库。在收集指标数据时存在缺失的数据,使用上下均值法进行合理补齐,以避免数据残缺影响回归结果。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 3。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类型	名称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方差
被解释变量	城乡共同富裕	0.75	0.24	0.50	1.02
解释变量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1.00	0.00	0.30	1.02
中介变量	高质量充分就业	0.68	0.11	0.35	1.11
	要素市场化配置	4.28	1.24	2.12	0.94
控制变量	公共财政支出	1.53	0.43	0.71	0.80
	对外开放水平	2.27	0.35	0.82	1.10
	科技创新水平	1.73	0.54	1.04	1.11
	人力资本水平	15.00	2.36	8.43	1.64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2.43	0.64	1.53	1.01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2.48	0.34	1.58	0.84
	农村基建水平	1.16	0.57	0.83	1.01

五、实证分析

(一)平行趋势检验

研究是以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开展的实证检验。需要强调的是,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政策效应必须满足平行趋势假设的要求,即在试点政策实施之前各城市之间的城乡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为确保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可用,研究采用“前四后四”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结果详见图 1。观察图 1 可知,以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实施前一年为基准期,实验组与对照组城市的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并不具有明显差异,说明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后续可以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识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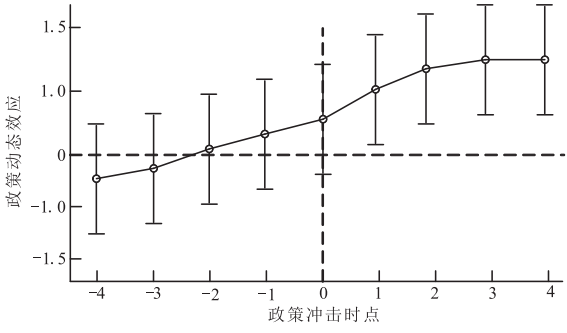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二）基准回归结果

为充分验证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是否有利于城乡共同富裕，使用前文所构建的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开展实证检验，对应回归结果详见表4。其中，列（1）~（8）为逐步加入各项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以避免外部未被考虑的变异因素干扰结果，进一步提高模型的解释能力。综合列（1）~（8）结果可知，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净影响系数不断缩小，但始终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证实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可正向促进城乡共同富裕。分析背后的经济学原因，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强调消除城乡要素流动的制度壁垒、降低要素交易成本，通过推动农村产业升级提升农民经济收入，助力城乡共同富裕。同时，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强调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农民群体可以获得均等公共服务与公共设施，加速推动城乡共同富裕。综上可以证明，假设H1成立。

表4 基准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城乡共同富裕							
	(1)	(2)	(3)	(4)	(5)	(6)	(7)	(8)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1.449**（0.202）	1.411***（0.209）	1.403***（0.220）	1.396***（0.228）	1.384***（0.228）	1.371***（0.181）	1.370***（0.218）	1.268***（0.193）
财政支农		0.854***（0.141）	0.794***（0.131）	0.773***（0.114）	0.725***（0.111）	0.711***（0.103）	0.698***（0.101）	0.638**（0.269）
对外开放			0.732**（0.337）	0.703**（0.314）	0.682**（0.313）	0.652**（0.276）	0.621**（0.257）	0.615***（0.083）
技术创新				0.533*（0.310）	0.522*（0.300）	0.487**（0.206）	0.463***（0.077）	0.429***（0.062）
教育水平					0.376**（0.160）	0.354**（0.149）	0.314**（0.130）	0.258**（0.099）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0.308***（0.044）	0.285**（0.047）	0.257***（0.035）
农村电商发展							0.352***（0.057）	0.252***（0.036）
农村基础设施								0.294**（0.137）
常数项	-7.478***（1.136）	-9.281***（1.430）	-9.237***（1.428）	-10.146***（1.648）	-11.327***（1.841）	-12.366***（2.008）	-12.452***（2.022）	-14.787***（2.139）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3810	3810	3810	3810	3810	3810	3810	3810
R^2	0.708	0.739	0.742	0.751	0.763	0.739	0.745	0.728

注：*、**、***代表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均同。

（三）稳健性检验

1. 反事实检验

考虑到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可能是由其他随机因素产生作用，故使用反事实检验避免随机因素的干扰。详细而言，随机选定试点城市与设立时间创造“伪实验组”，在此基础上重新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开展检验，并将此过程随机重复800次，对应回归结果分布情况详见图2。依据图2回归系数与*P*值分布情况可以知悉，所有伪变量的回归系数普遍分布于0值附近，且同基准回归系数1.268存在较大差异，相应*P*值也并不显著。由此证实，基准回归结果排除其他随机因素的影响，充分证实假设H1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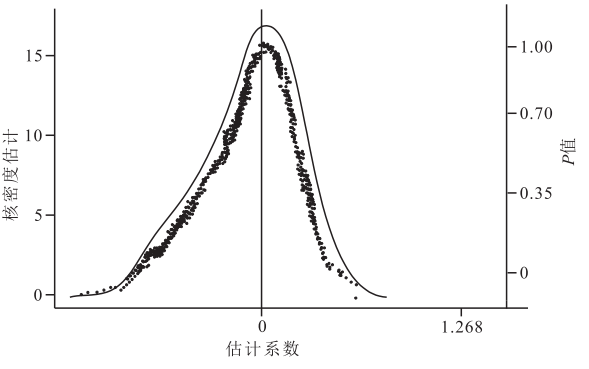


图2 反事实检验结果

2. 异质性处理效应

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政策净效应时,控制双向固定效应(TWFE)可能存在潜在的估计偏误,导致负权重或“坏实验组”出现。为避免这一问题影响,借鉴已有研究以 DID 估计量分解法进行排除,结果详见表 5。根据数据显示,早处理组与晚处理组的“坏结果”权重占比仅为 2.6%,而处理组与从未处理组的权重占比高达 84.1%,证实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后的回归数值并不存在明显偏误,充分证明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 5　Bacon 分解结果

Bacon“2×2”分解	估计系数	权重占比
早处理组 vs. 晚处理组	-0.073	0.026
处理组 vs. 从未处理组的比较效应	1.292	0.841
同组差异	0.012	0.063

3.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PSM-DID)

考虑到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选择是在政府部门综合考虑经济基础、技术创新水平等因素后选定,故实验组可能并非完全随机选择。有鉴于此,重新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以避免错误识别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政策净效应。详细检验过程如下:将选定的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以 1∶1 最近邻进行匹配,对匹配后的样本重新进行检验,结果详见表 6 列(1)。根据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影响系数虽然略有波动,但仍在 1% 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再次证实基准回归结果可靠。

4. 剔除其他政策影响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是政府部门在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分批推出的重要政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破除要素流动壁垒,为城乡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动力。基于这一背景,为避免“宽带中国”政策干扰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将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与“宽带中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加入所构多期双重差分模型重新检验,对应结果详见表 6 列(2)。根据数据显示,“宽带中国”的试点冲击后并未对核心结论产生影响,充分证明假设 H1 成立。

5.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

基于科学性与系统性的视角,研究在衡量城乡共同富裕时选择使用构建指标体系的方式,而具体指标选择时仍然可能存在遗漏,难以系统衡量城乡共同富裕指数。而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指标,也可精准反映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因此,研究重新采用基尼系数代替指标体系衡量城乡共同富裕,在此基础上重新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展开回归,结果详见表 6 列(3)。数据显示,使用基尼系数替换指标评价体系之后,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回归系数为 1.424,在 1% 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佐证假设 H1 成立。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PSM-DID	剔除其他政策影响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
	(1)	(2)	(3)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1.024***(0.152)	1.177***(0.179)	1.424***(0.183)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与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政策的交互项		-0.049(0.04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项	-5.288***(0.693)	-2.842***(0.317)	-8.693***(1.132)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3675	3810	3810
R^2	0.762	0.741	0.759

(四)中介作用检验

根据前文理论假设,高质量充分就业与要素市场化配置在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基于前文所构式(2)进行中介作用检验,相应回归结果详见表7。根据表中列(1)结果可知,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回归系数为0.433,在1%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可正向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水平提升。从这一实证结果来看,高质量充分就业确实在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中具有中介作用。深度分析根本原因可能在于,作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举措,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通过扩大农民群体转移市场,促使更多农村居民"进城",从而获得更为宽泛的就业空间,脱离单纯的农业收入桎梏,实现农村居民高质量充分就业。在一定程度上,高质量充分就业既可提升居民非农收入,使农村居民同城市居民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促进城乡共同富裕。同时,高质量充分就业也可通过完善多层次的就业保障、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促使农民群体在就业中提升自身的精神满足感与个人幸福感,实现精神层次的城乡共同富裕。就此,假设H2得到经验证据支持。

进一步根据列(2)回归结果可知,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对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证实要素市场化配置如预期一般发挥中介机制效用,即假设H3得到经验证据支持。分析要素市场化配置中介效应存在的经济学原因,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是以打通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制度通道为核心的政策,强调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从这一逻辑来看,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可推动技术、知识、资本、高水平劳动力等高阶要素流向农村,破解城乡要素市场分割的困境,助力要素市场化配置。而要素市场化配置可以形成更大规模的发展增量,助力城乡共同富裕。同时,要素市场化配置可实现要素自主有序流动、高效公平配置,利用再分配机制促使城乡居民均衡享受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扎实推动城乡共同富裕。

表7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高质量充分就业 (1)	要素市场化配置 (2)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0.433***(0.109)	0.448***(0.066)
控制变量	是	是
常数项	-3.673***(0.554)	-6.459***(1.254)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N	3810	3810
R^2	0.747	0.719

(五)异质性检验结果

1.城乡共同富裕类型的异质性检验

依据城乡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从细分维度而言,城乡共同富裕可以划分为发展性与共享性两个层面。就此,根据发展性与共享性进行城乡共同富裕类型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列于表8列(1)、列(2)。进一步地,Chow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000,证实分组检验的结果有效。比对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对发展性与共享性的回归系数及显著性,可以明确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对共享性的影响系数为1.327,在1%水平上显著,明显强于发展性。产生这一差异影响的原因可能在于,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以促进农村人口转移、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探索目的,侧重补齐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共享"短板,故对城乡共同富裕共享性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偏低、农村人口老龄化等多重现象并存,使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在短期内难以释放其对发展

性的推动效应,故而产生这一异质性影响效应。

2. 人口规模异质性检验

在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内,人力资本作为核心投入要素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由此而言,城市人口规模可能影响人力资本要素的总量投入、结构配比和使用效率,使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出现差异。对此,根据《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将所选城市样本划分为大城市及以上规模城市(常住人口为 100 万以上)、中小城市(常住人口为 100 万以下)进行分组检验,对应回归结果详见表 8 列(3)、列(4)。同时,Chow 检验结果显示,P 值为 0.000,证明分组检验结果可靠。对比回归系数及显著性可知,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对人口规模是大城市及以上规模城市的城乡共同富裕系数为 1.334,在 1% 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明显强于中小城市。出现这一差异化影响效应的原因可能在于,大城市以上规模城市具有更为充足的人力资本基础,可以充分释放人力资本集聚效应并在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推动下流入农村,为城乡共同富裕提供人力资本支撑。而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中小城市却因人力资本存在缺位,难以为驱动城乡共同富裕提供充足人力资本支撑,故导致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效应发挥受限。

3. 所属经济地带异质性检验

东部地区依靠外向经济与创新驱动模式实现经济增长稳中向好、供需结构持续改善,对应农村已经率先实现基本的现代化,而中、西及东北地区的农村却因诸多层面限制同东部地区存在明显差异。对此,依据国家统计局关于经济地带的划分标准,将所选城市样本归类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两组进行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详见表 8 列(5)、列(6)。进一步地,Chow 检验结果显示,P 值为 0.000,证实所属经济地带异质性检验结果具有可靠性。比对回归结果的系数及显著性可知,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对东部地区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系数为 1.378,在 1% 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明显强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因经济地带出现差异化影响效应的原因可能在于,东部地区依靠经济基础、科技实力、产业生态等领先优势,依托集聚效应吸引大量优质要素,为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提供条件支撑。反观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农村居民尚处于完全脱贫之后的调整发展阶段,难以充分释放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对城乡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表 8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发展性	共享性	大城市及以上规模城市	中小城市	东部地区	中、西部及东北地区
	(1)	(2)	(3)	(4)	(5)	(6)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0.925**(0.382)	1.327***(0.214)	1.334***(0.259)	0.726**(0.333)	1.378***(0.205)	0.735**(0.31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4.239***(0.761)	-3.984***(0.872)	-2.569***(0.353)	-3.242***(0.477)	-3.138***(0.416)	-3.599***(0.424)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3810	3810	1500	2310	1275	2535
R^2	0.824	0.751	0.803	0.731	0.813	0.742
Chow 检验 P 值	0.000		0.000		0.000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将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 2008—2023 年我国 254 个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在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与城乡共同富裕之间的因果关系与中

介机制。回归结果证实: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对城乡共同富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地,经过反事实检验、异质性处理效应、倾向得分匹配检验(PSM-DID)、剔除其他政策影响及替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式之后发现,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随后,中介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经由高质量充分就业、要素市场化配置两条路径,对城乡共同富裕产生间接推动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证实,相比发展性层面、中小城市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而言,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在共享性层面、大城市及以上规模城市、东部地区对城乡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强。

(二)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扩容提质

基准回归结果证实,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对城乡共同富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针对此,政府部门系统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扩容提质,为全面推动城乡共同富裕提供更强政策动能。一方面,推动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范围扩容。中央及省级政府应在现有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推动试点范围不断拓宽,打造全面覆盖的新型城镇化引领格局,为城乡共同富裕注入政策动能。另一方面,推动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内容提质。各级政府需在已有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内容基础上,逐步深化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人地钱"挂钩机制设立,并以县域为新载体补齐新型城镇化中的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等各项短板,充分释放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其二,持续深化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引领。中央政府需借助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推广契机,不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人地钱"挂钩制度安排,并着力补齐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助力城乡共同富裕。

2. 持续完善高质量充分就业制度支持

根据前文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知,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因此,各级政府部门需持续完善高质量充分就业制度支持,扎实推动城乡共同富裕。具体而言,地方政府部门应以县域为中心,通过税费减免、土地优惠、贷款补贴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推进县域产业园区建设,拓宽农民高质量充分就业空间。同时,政府部门应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实施过程中,着力推进农民就业技能、文化素养培训,通过提高农民群体素质使其在非农就业过程中获得更优待遇与保障。另外,政府部门需充分重视农民在非农就业过程中的权益保障,通过持续建立健全农民就业的法律保护制度保障农民非农就业的基本权益。除此之外,政府部门可以县域为中心建立农业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利用数字平台为农民及返乡创业人才提供政策查询、信息指导,为农村居民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更高质效服务。

3. 加快构建城乡统一资源要素市场

根据前述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可知,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可通过市场要素市场化配置间接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据此而言,政府部门应加快构建城乡统一资源要素市场,为城乡共同富裕提供要素自由流动的空间支撑。统一数据要素市场层面,政府部门需在农村现有网络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持续推进农村地区5G基站与千兆光纤布局,为城乡数据要素自由流动提供载体支撑,以此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统一土地要素市场层面,中央及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机制,允许村集体组织在符合规定的要求下自愿将村内闲置土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流转。同时,地方政府应充分探索、构建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允许农户将闲置宅基地、房屋通过有期限的转让进行资产盘活,以此提升农民财产性收入,助力城乡共同富裕。统一技术要素市场层面,地方农业部门应建立农业科研机构、农业高校的联合机制,畅通科技研发与推广应用路径,释放科技创新对城乡共同富裕的支撑效能。

参考文献:

[1]颜廷武,王璐瑶. 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机理与路径[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15 - 25.

[2]李青嵩.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面临的结构性失衡及破解路径[J]. 新疆社会科学,2023(3):49 - 58.

[3]李强,唐幼明.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城市低碳治理——基于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实施的准自然实验[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117 - 129.

[4]刘耀彬,邓楠,刘亦文,等. 新型城镇化建设、要素结构变迁与城市空气质量改善——基于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 南开经济研究,2025(4):3 - 21.

[5]焦娜.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农户生计可持续研究[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63 - 80.

[6]侯婉薇. 新型城镇化改革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县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16):96 - 108.

[7]马双,胡雯镞. 新型城镇化与工商资本下乡——基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准自然实验[J]. 经济科学,2025(1):92 - 118.

[8]汤颖梅,李佳辰,刘荣茂. 新型城镇化政策试点能否引致县域金融资源配置优化?[J]. 经济问题,2024(11):111 - 120.

[9]张明斗,乔雪蓓. 新型城镇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与机制研究[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48 - 55.

[10]杨宇,赵婉旭,伍骏骞,等. 新型城镇化的共同富裕效应——基于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的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25(3):46 - 61.

[11]田祥宇,曲国华,褚靖铭. 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决策分析——基于中国县域面板数据[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118 - 134.

[12]许睿杰. 数字政府建设、农业创业活跃度与城乡共同富裕[J]. 统计与决策,2025(13):83 - 88.

[13]韩先锋,肖坚,宋文飞. 数智化与城乡共同富裕:来自村级微观空间的证据[J]. 财经科学,2025(5):123 - 136.

[14]贺建风,周玉兰. 数据要素市场化、新质生产力与城乡共同富裕——基于数据交易平台设立的准自然实验[J]. 经济问题探索,2025(5):91 - 109.

[15]雷永阔. 城乡融合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关联机理、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 科学社会主义,2025(1):89 - 95.

[16]张世贵. 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的价值意蕴、生成逻辑及行动框架[J]. 中州学刊,2025(1):65 - 73.

[17]程静,陈佳睿. 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能促进城乡共同富裕吗? ——基于城乡收入差距视角[J]. 世界农业,2025(4):76 - 90.

[18]李彩平,张守夫.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建设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5(1):21 - 30.

[19]孙方.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路径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2023(5):162 - 168.

[20]井钦磊,林琛,章文光. 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了吗? ——基于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J]. 改革,2025(2):132 - 146.

[21]王宁西.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的高质量充分就业[J]. 北京社会科学,2024(2):74 - 83.

[22]周闯,郑旭刚,许文立. 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J]. 世界经济,2024(4):212 - 240.

[23]丁涵浩,葛扬. 以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5(7):16 - 31.

[24]边悦玲,魏晓文. 创新要素市场化如何推动共同富裕? ——基于城乡收入差距视角[J]. 科学管理研究,2023(6):18 - 26.

[25]于赟,秦冠宇,李韬. 金融帮扶政策与低收入农户的收入效应[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56 - 72.

[26]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2022(5):100 - 120.

[27]习近平.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J]. 求是,2024(21):4 - 8.

[28] PARSLEY D C, WEI S J. Convergence to the law of one price without trade barriers or currency fluctuations[J]. So-

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996(4):1211 – 1236.
[29]金环,于立宏,徐远彬. 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企业创新效率[J]. 经济评论,2024(5):20 – 36.
[30] GOODMAN-BACON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with variation in treatment timing[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21(2):254 – 277.

The Effect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Comprehensive Pilot Policy on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E Jing[1,2a], LIU Zhen-ya[2b]
(1.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2. *a. School of Literature*; *b. School of Business*,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224002, *China*)

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pilot of new urbanization is a crucial policy for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gap and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roviding policy impetus for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Using panel data from 254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9 to 2023,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index of urban-rural common prosperity using the entropy method. Leveraging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provided by the comprehensive pilot of new urbanization, it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this pilot on urban-rural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odel.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pilot of new urbaniz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promoting urban-rural common prosperity.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after counterfactual tests, heterogeneity treatment effects,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D (PSM-DID) tests, exclusion of other policy influences, and substitution of the measurement of the dependent variable. Mediation mechanism tests reveal that high-quality full employment and market-oriented factor allocation play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impact of the comprehensive pilot of new urbanization on urban-rural common prosperity. The heterogeneity test results confirm that the comprehensive pilot of new urbanization has a stronger promoting effect on urban-rural common prosperity in terms of shared prosperity, in large and above cities, and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poses expanding and enhancing the comprehensive pilot of new urbanization,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high-quality full employment, and acceler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fied urban-rural resource and factor market.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pilot of new urban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igh quality and full employment; market oriented allocation of factors

【责任编辑:杜晓艺】